

# 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议题与未来趋向

白云真<sup>1 2</sup> 曹明星<sup>3</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北京 100028; 2.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3.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1)

**【摘要】** 新市场财政学者承担起知识批判者和创新者的角色与责任,旨在为财政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性辩护,批判地分析现代性框架之中的西方主流财政理论,试图紧密联系中国财政实践和其他国家财政实践,考虑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对于理论建构的意义,构建财政学的新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构建中国财政学派的有益尝试与大胆探索。作为中国财政学派建设路径之一的新市场财政学路径需要立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西方与亚洲及中国的财政事实,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构建中国财政学派的着力点,提升财政学研究的历史境界、科学境界、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着力构建具有理解力、解释力的以及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关键词】** 财政学; 新市场财政学; 共同需要; 中国财政学派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9.05.011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9)05-0127-11

## 一、引言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完善财政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如何推进国家财政治理体系和财政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财政学界重大的时代课题之一。在为国家财政治理体系以及现代财政制度等提供学术支撑方面,财政学的学术创新在理论或是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构建中国财政学派成为财政学者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与研究主题,已成为引领大国财政变革的新时代先声。中国财政学需要解决财政学无法充分理解与解释中西财政变迁和财政发展的理论困惑与实践困境,然而中国财政学仍然停留在对现象和事实描述的层面上,未能从理论高度诠释中国财政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也未能科学客观地总结和描述我国财政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功能与作用。<sup>[1]</sup>中国财政治理体系及其财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迫切需要学者们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角度加以理性地探讨,以突破经济学科的藩篱,扩大财政学的学科视野,实现财政学研究的理论转型。

**【基金项目】**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财政基础理论创新课题“新市场财政学: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演绎”;中央财经大学教师“思政+”专项基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作者简介】**白云真(1975-)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财政学者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财政实践为观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财政学派,需要把财政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思想、水准提升到新的水平,以此体现财政学的文化继承性、当代实践性以及学术系统性,形成中国财政道路自信、财政理论自信、财政制度自信和财政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财政学派建设的关键在于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与中国文史哲传统基础上推动构建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中国哲学思维与学术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关键。

以李俊生为代表的新市场财政学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深刻的学术反思继承社会科学传统上的强烈批判精神,承担起知识批判者和创新者的学术角色与学科责任,旨在构建财政学的新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构建财政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财政学的有益尝试与大胆探索。新市场财政学重新定位市场与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力图建立起以“社会共同需要”为理论源泉、以“公共选择”为方法论基础、以公共价值为政府财政活动诉求的新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其学术意义与研究议程值得中国财政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持续不断的深入关注。

## 二、新市场财政学的议题及其价值

新市场财政学以文献研究法等从财政学科史、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明确了重构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将核心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这一体两面视为重构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条件,批判分析西方主流财政理论,试图建构财政政策与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或分析工具,明确建构中国财政学派的意义与任务。<sup>[2]</sup>新市场财政学扬弃国家分配论,在公共财政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新市场观,将市场视为一个政府和企业都参与的一个平台。李俊生等认为,从财政学的角度看,如何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内在相容性和政策意图,是需要财政学界回答的根本性问题。<sup>[1]</sup>新市场观、新政府观的构建是新市场财政学的内涵,而且以关联性思维而非二元对立思想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新市场财政学的核心理念。新市场财政学展现了其对财政学的自我理解,着力加强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在财政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做出创新性努力。

### (一) 重新定位财政学科

尽管有学者以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等开展财政学的跨学科研究,但是并没有将财政学置于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新市场财政学明确反对将财政学纳入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的学科范畴,而将财政学视为跨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视为连接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核心纽带,视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的策源地与母学科,竭力纠正财政学的经济学化现象。西方主流财政学界抛弃了财政学自身的基本范式进而采用经济学范式研究财政问题,把财政学变成了财政经济学。<sup>[3]</sup>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把财政范畴视为经济范畴。如布坎南所言,作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甚至凯恩斯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财政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私有经济中各种财政制度对个人或集团行为的影响。<sup>[4]</sup>新市场财政学对财政学的重新界定和定位有助于重新界定财政学的学科性质,打破财政学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区别与壁垒。

传统上,中国学者往往将财政视为特殊的经济范畴或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曾经也将财政视为货币关系。邓子基认为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而且财政学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关系。<sup>[5]-[7]</sup>陈共认为,“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中国财政学界往往更注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财政学,相对而言不太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财政学,过于强调财政学是研究财政运行规律,反而忽视财政收支治理的实践。<sup>[8]</sup>因而财政学的单纯的“经济理论观”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其对财政活动性质在认识上的迷失,而经济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也导致了有关学者们在指导政府财政活动、影响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误导作用。<sup>[9]</sup>受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财政学者无法充分地探讨财政目的及其决策等关键性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

受欧洲大陆学派的启示,新市场财政学不再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认为财政学有其独立存在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从而整体性思考财政学科,突破了财政学的现有学科边界。在布坎南看来,税收和开支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而不是单独的个人的事。这个特点把财政学和经济学中的其他传统的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这些传统的分支学科大都集中研究(如果不是全部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的活动,以及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家、工人等的行为。<sup>[10]</sup>可见,财政学科有其不同于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如财政收支、财政政策等。“财”字作为“政”的修饰语,两个字合在一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财政的核心思想——关于对“财”的政治与治理。<sup>[9]</sup>因而,财政学研究对象并不限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还包括财政现象、财政政策、财政行为、财政决策等。实际上新市场财政学立足于财政活动的政府行为性质而定位财政学的学科性质。

新市场财政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定位有助于摆脱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财政学研究的藩篱与束缚。如沃勒斯坦所言,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sup>[11]</sup>财政学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而是需要以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将多学科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财政学本身专有的理论与方法。现在,学科内部的差异往往大于学科之间的差异。随着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社会科学家正在跨越旧的学科之间的疆界。<sup>[12]</sup>因而新市场财政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财政学的跨学科理解上,反而强调需要建立独立的、能够科学解释财政活动与财政现象、能够科学揭示财政活动规律的、具有完备的知识框架结构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sup>[9]</sup>由此,新市场财政学为建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与方法奠定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基础,跳出财政研究中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限制。

## (二) 批判地分析主流财政理论

新市场财政学批判地分析与借鉴国家分配论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欧洲大陆学派,反思其三者的政治假设、社会假设与历史假设,在解构的基础上加以重构。国家分配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社会总产品分配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早期由许毅、许廷星、邓子基、陈共、姜维壮、叶振鹏、赵春新等老一辈学者借鉴苏联的财政理论创建。在新市场财政学看来,国家分配论所关注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将财政学研究领域局限于阶级社会。

以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哈维·罗森(Harvey S. Rosen)、大卫·海曼(David

N. Hyman) 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以市场失灵理论为起点,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为核心,以福利经济学范式为基础,将财政学视为研究干预经济以达到自身目的的科学,视政府为独立于社会经济之外的自治体,无法解释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公私伙伴关系运动中政府及公共部门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所依赖的市场失灵理论具有实用主义的本质与偏狭的政策导向功能,往往致使财政理论仅仅局限于财政政策分析领域。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学派将政府视为经济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实体的组成部分,致力于经济、政治、法律和行政等因素的整合性研究。不可否认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欧洲大陆学派是特定时期财政实践的理论总结、抽象和概括。

欧洲大陆学派及其后继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范式与研究方法为财政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欧洲大陆学派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财政理论的局部结构会随着社会内部支配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模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其基础性的理论原则与概念不会变化,只是体现这些基础性理论原则与概念的具体事例会因制度内容安排的不同而有所不同。<sup>[9]</sup> 作为一位秉承欧洲大陆学派理念的财政学者布坎南将公共选择运用到政治领域、政府财政领域,关注各个利益集团在财政行为中为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公共选择,否定了政治学家们关于政治家一般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来参与公共政治活动的观点,<sup>[9]</sup> 为财政决策提供了公共选择这一基本方法论。公共选择就是以经济学作为工具和方法,进行政治决策分析。<sup>[10]</sup> 瑞典经济学派的主要创始人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 强调指出财政结果产生于财政制度,如果引进改革的机制,制度结构就必须修正……政治选择的制度和进行税收与开支选择的制度是可以相互代替的。<sup>[10]</sup> 在新市场财政学看来,政府财政行为准则以社会共同需要为目的,通过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实现公共选择,谋求政治决策效率与公正。<sup>[9]</sup>

### (三) 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概念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学校、保健设施等“共同需要”,而且认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sup>[13]</sup> 中国学者对社会共同需要的关注始于1980年北戴河召开的全国财政基础理论理论高层研讨会,初步形成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理论财政学》<sup>[14]</sup>。新市场财政学继承了何振一等学者的研究传统,将社会共同需要视为财政学学科的核心概念体系的基础。财政问题是选择问题,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选择的问题。<sup>[9]</sup> 人类社会财政活动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共同需要,由此决定了财政活动具有社会集中性的基本特征。由此观之,新市场财政学并不仅仅将财政视为经济现象、政治现象,而且视为与社会有关的现象,因而并不限于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将社会因素纳入考量之中。

相比之下,国家分配论以国家的强制力及其需求作为财政学的核心概念,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则将市场失灵作为财政学的核心概念。新市场财政学者抛弃了作为主流财政理论基础的“市场失灵理论”,将“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贯穿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中枢环节,并且认为只有围绕“社会共同需要”这个核心概念展开,财政学才能够形成一系列具有科学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体系。

### (四) 确立市场平台观、政府参与观

新市场财政学指出财政学界将国家与政府混同使用的现象 将市场视为一个平台 而且认将市场视为一 0 燃

。

试图社会地建构财政学理论与方法的新观念,揭示出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寻求绝对真理的谬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学所面临的专业化与学科分化的挑战。新市场财政学学者秉承文史哲的中国学术传统,将财政学重新界定为现代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财政学术传统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新市场财政学剖析我国财政理论全盘英美化的现象,试图构建中国本土创造的财政思维与知识、财政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反思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西方二元哲学思维方式,强调理论与实践(即知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进而把私人部门与市场等同起来,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这种理论与实践严重背离、逻辑与历史严重错位的理论基础。<sup>[3]</sup>新市场财政学并不将政府视为站在市场对立面、居高临下的干预者,将其视为市场的参与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某种程度上却忽视了政府与市场相反与矛盾的维度。尽管新市场财政学仅稍微论及“市场交互关系”<sup>[3]</sup>,但是这一观点反映了中国文化与哲学所体现的关联性思维。

当然新市场财政学在新市场模型的基础上将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组织目标的公共部门和以私人价值最大化为组织目标的私人部门都视为市场平台的参与者,仍然并没有彻底解决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者目标之间冲突的矛盾,事实上仍带有二元论、两点论的思维特点。

### 三、新市场财政学的未来研究趋向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学,其理论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事实描述与归纳,而且其理解力、解释力、建构力必须有充分的财政历史事实与现实的支撑,财政学理论研究需要规范的实证研究,对具体财政目的、财政制度、财政决策、财政政策、财政选择、财政行为及其后果进行科学、逻辑的因果性解释与主观性理解。一个好的理论都有以下五个部分:归纳(Induction)、推导(Deduction)、因素(Factors)、因果机制以及过程(Processes)。<sup>[17]</sup>财政学基础理论并不是财政政策或对财政政策的归纳和总结,必须以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有机结合为基础,进一步明确成本效益分析法与公共选择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仅仅是简单地把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加总在一起,也是无法客观全面地揭示财政运行规律的,财政学需要对相关学科进行融合并形成财政学本身专有的理论范式与方法。<sup>[9]</sup>新市场财政学需要关注财政学及其实践中的实质性议题,避免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机械与形而上学的整合以及学科知识的碎片化,从而切实推动财政学的知识与实践转型,进而维系财政学科的自主性。

#### (一) 深化财政学的社会科学哲学整体性反思

如果我们还希望能够对这个变化中世界里的财政及其财政学所面临的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把握,那么财政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哲学就不应该被割裂起来。事实上财政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增强。新市场财政学不仅仅要解决方法论问题,更需要社会科学哲学的自我反思,避免自我思考式的学科叙述。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科学并不处于中立的地位,而是技术变革中的工具;批评也能够局限于对错误理念的批判。双重阐释指的是社会科学家应该警惕其理论和概念对他们试图分析的现象的改变能力。<sup>[12]</sup>中国财政学者需要有机地结合建构论和实在论,将建构论和实在论统一在财政学重构的努力之中,更关注财政决策及其行为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文本的解释。

新市场财政学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为当代财政学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仍然如盎格鲁-撒克逊学派那样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条件阐述财政学基本范式及其理论渊源,某种程度上仍有经济学科或政治经济学科的烙印,需要更深度的哲学反思。科学逻辑并不只依赖于证伪原则,因为一个理论被抛弃并不只因为它被证伪了,还因为它被更加合理的新理论取代了。<sup>[12]</sup>新市场财政学将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与公共价值分别列为分析性因素,实际上体现了两点论的二元论色彩,并没有将利益与伦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受布坎南等学者的学术话语和方法论的影响。布坎南在其财政学中侧重研究政治家自私以及利益集团等非经济力量如何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但是这种研究仍然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传统的影响。

新市场财政学更多体现了对欧洲大陆学派的传承以及当代主流财政学理论的反思,反而对唯物辩证法及其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缺乏明确的应用。布坎南将经济学上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公共选择方法应用到政治决策及其机构与宪法规则分析之中,集中探讨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如何分配税收问题而不是探讨税收应该如何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的问题,进而探索不同的财政制度是如何影响相应的公共选择人的信息和观念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原则认为,社会行为能够从单个的个体行动得到解释,而所有这些个体的行动的集合就构成了社会。由此,社会被还原为个体行为——用霍布斯的原话来说,就是:寻求其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动者的有目的的行为。<sup>[12]</sup>布坎南意义上的公共选择方法是个有关“政府失败”的理论,至少相比于威尔逊-韦伯派的官僚政治概念有关公共利益的设想。

### (二) 回归到“共同需要”的概念

财政学研究的不仅仅是物,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不同阶层或社会力量之间、国家与民众之间有差别的需要或共同的需要。马克思以“共同需要”的概念超越相对狭隘的政府需要以及财产者的特殊需要,因而新市场财政学者不应当拘泥于“社会共同需要”,反而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共同需要”概念,放宽“社会共同需要”的概念性内涵,历史性地赋予“共同需要”以具体的概念性内涵,辩证地思考“政治共同需要”、“经济共同需要”、“社会共同需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所谓我们国家的利益,照我的理解,既不是指一个内阁的党派措施,也不是指一个宫廷的任何对外政策的动机,而正好是指那种今天且永远应该是同维护国王的安全、舒适、尊严和收益以及大不列颠的公共福利直接有关的事情。<sup>[18]</sup>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仅是人自己本身,而且是人的世界,即所处的国家、社会。马克思从经验而非抽象角度关注物质生产的现实前提下人与人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及其与物质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并未仅仅将共同需要限定在社会因素,而且也将安全、利益等政治经济需要包括在其中。当然马克思反对财政政策所体现的狭隘的特殊需求,但并不反对国家的人民-民族的共同需要以及国家之间的共同需要。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19]</sup>那么“共同需要”并不局限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疆域内,反而往往具有跨境性乃至全球性,即全球共同需要。因而一国的财政政策与行为不仅需要解决其自身的共同需要,而且随着跨国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需要解决跨越国境的、特别是人类发展的共同需要,从而为地区与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三) 财政现象的系统分析

实际上,中外财政体系本身就具有复杂、系统、综合的特性,因而公共选择等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难以完整有效地理解财政现象。财政作为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媒介环,能起到统合社会的作用。<sup>[20]</sup>新市场财政学不仅限于将财政现象视为经济与政治的交叉现象加以理解和把握,还需要关注财政现象的社会因素,将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有机整合在一起。研究者必须考察不同的社会力量在财政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轻重,特别是社会力量在财政中起作用的实际因素、机制或是过程,但并不仅仅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为了理解财政这一复杂系统及其历史与现实,研究者称917 B 穀普 牟煌 蛩厥凳机的综合(Organic Synthesis)。有机综合的最核心标志是将不同范式所阐明的不同力量或方面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理解社会现实的关键变量。因此,有机的综合远不止“分析方法的多元化”那么简单,后者只不过是把不同范式,或者甚至仅仅把学派塞进一个分析框架里,而不是强调这些力量和方面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关键变量。<sup>[21]</sup>尽管社会科学在本体论上存在着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的分野,但是财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个体力量与整体力量的多重 B,具有冲突性以及和谐性。因而财政学科必须建立在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虽然新市场财政学仍然关注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的产权交易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价值理论等西方理论与方法,但已意识到财政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因而研究者称91 徊揭韵低乘嘉 谋淇吹讲普 澜缙 方式,以一套概念性工具建构中国财政学派的分析性框架,从而更为出色地理解财政现象而且推动更为有效的财政行动。系统具备如下两点:一是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办法发生变化;二是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sup>[22]</sup>系统思维会赋予财政学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思路,揭示出财政世界的许多复杂状况和有趣之处。为了获得完全的理解,解释者必须将整体与部分联结起来。意义只有在一个更加大的背景下才会呈现。诠释学的任务是917分散的意义单元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为此,观察远远是不够的,因为意义不会从属于简单的解说与描述(这些都是实证主义的特征)。诠释性的理解必须对意义的多层真实保持直觉的、敏感的警惕。<sup>[12]</sup>在财政系统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避免宏观与微观之间、梳为体与结构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学术性区分。

#### (四) 构建和而不同的理论性框架

新市场财政学不应拘泥于当前对主流财政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反而称91 徊浇沂境鲋流财政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性及其可取之处。新市场财政学强调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无法解释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公私伙伴关系运动中政府及公共部门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在学术局限性方面并不限于此,而是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等具体财政历史与现实相脱离。新市场财政学借鉴了欧洲大陆学派的参与型政府模式,称9以其所用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范式将欧洲大陆学派与传统中国财政观相比较。新市场财政学的市场平台观、市场规则观往往将政府角色降低到最低程度,相比较而言布坎南更重视市场的作用,持更为自由的政治经济主张。



财政学研究需要多种不同的理论性视角和研究方法,突破常规性的和褊狭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性框架。新市场财政学应该在比较研究与分析基础上构建出更为普遍意义的、和而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以判断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不同财政理论流派中不同的轻重。何振一认为本着坚持真理但又不固守成见的治学精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唯真理地看待三个理论流派之间关系,就会发现在财政学科建设上三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完整的财政学科建设中,是完全可以包容的。<sup>[23]</sup>由此,研究者以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内共同需要与外部共同需要之间的关系、理论观点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等,寻求财政现象中二元对立统一的概念性范畴中的比例平衡。

#### (五) 推动新市场财政学的中国文化建构

中国文化资源与哲学思想是新市场财政学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中国财政学派范式创新的基石。人们通常要花费一个时代的时间去打破某种旧范式,因为这种打破往往需要文化价值上的转变。<sup>[12]</sup>中国哲学思维与历史记忆深刻影响着中国财政学者与实践者对财政的理解,而且中国财政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上是建构新市场财政学尤其是中国财政学派的经验基础。财政学理论的起源并不始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产生于17至18世纪的德国官房学派,更是始于古希腊家政学、中国古典财政学。<sup>[24]</sup>中国有着深厚的财政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财政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理财家与政治家等的知识智慧与理性思辨。因而财政研究者需要关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中国经典的财政哲学以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等中国自身的财政实践问题,推动财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财政及其重大问题相协调,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财政理念、主张、方案。

某种程度上而言财政学本质上以民富国强为目标,力求改变国富民穷的不平衡状态。中国财政学者需要以当代中国财政实践为中心,观察与理解中国财政事实,从中国改革发展的财政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社会主义财政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做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sup>[25]</sup>因而如若研究者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财政学,那么财政学的中国学派不应立足于或拘泥于中国财政事实与经验以及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必须关注西方国家、亚洲国家的财政历史,放宽理论建构的历史视界,以中国的视角、语言、概念补充和更新现有财政知识与理论、方法,从而为确立中国财政学派的普遍意义奠定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基础。

#### 四、总结

新市场财政学聚焦财政学不同流派的分歧与争论,思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财政学以及如何建设等实质性问题,探索重建财政学的学术方向,是中国财政学派建设的途径之一。新市场财政学的新主要体现在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重新认识。新市场财政学“新”在:在对市场失灵理论的批判和解剖的基础上,借鉴欧洲大陆学派财政理论合理内核重新定位公共部门、私人部

门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探寻重构与完善财政理论的新的分析与研究范式。<sup>[3]</sup>中国财政学者需要回归到知识创新者的角色,根据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诸学科间关系的变化,重新标识与界定财政学及其意义,批判地分析国家分配论学派、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欧洲大陆学派,属于中国学者建构中国本土特色的财政学努力的组成部分,为中国财政学派奠定了批判性分析基础,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必将激起富有进取心的学术探索精神,可谓开拓性的学术努力。

新市场财政学更多地将其理论渊源界定为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与欧洲大陆学派、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共同需要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价值论等,阐明急需摆脱财政幻觉与错误信念的必要性,尚需进一步解释盎格鲁—撒克逊学派逻辑与历史错位的根源与表现。新市场财政学力图推进研究视角的转变,反映了其学术理解力与反思力,却不应仅仅局限于其所强调的对财政实践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实际上,新市场财政学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对财政实践较强的理解力,但是其解释力尚需要因果性论证加以支撑,需要推进更规范的研究,将实证分析的结果应用到政策改革中。如果研究者并不首先明确地理解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再多的方法论讨论也无法推进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由此观之,中国财政学派需要立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西方与亚洲及中国财政事实,坚持问题导向以及为国为民导向,提升财政学研究的历史境界、科学境界、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着力构建具有理解力、解释力及其建构力以及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中国财政理论必需根据当前正在变化的社会科学及其诸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本土财政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因而研究者尚需跨越学科的传统分野,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以及科学的思维方法,明确财政事实及其价值的联系,聚焦财政学的根本性问题,在财政学与现代民主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界定财政学的学科角色,将财政学知识与其经济目标、社会目标以及政治目标有机连接起来,在财政知识与国家治理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以此坚持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与历史辩证思维推进财政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新议程,努力建构中国财政学派,推进财政学中国化与本土化。

#### 参考文献:

- [1]李俊生,姚东旻.财政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兼评市场失灵理论的“失灵”[J].经济研究,2018,(09):22-38.
- [2]李俊生.建立财政学的中国学派[EB/OL].[http://www.cfen.com.cn/rwcj/sxh/201606/t20160621\\_2334052.html](http://www.cfen.com.cn/rwcj/sxh/201606/t20160621_2334052.html).
- [3]李俊生.新市场财政学:旨在增强财政学解释力的新范式[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05):3-11.
- [4][美]布坎南.民主财政论[M].穆怀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5]邓子基.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J].中国经济问题,1962,(11):12-22.
- [6]邓子基.略论财政本质[J].厦门大学学报,1962,(03):115-123.
- [7]邓子基.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J].中国经济问题,1962,(04):13-21.
- [8]陈共.财政学对象的重新思考[J].财政研究,2015,(04):2-5.
- [9]李俊生.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财政理论的破产与科学财政理论的重建——反思当代“主流”财政理论[J].经济学动态,2014,(04):117-130.